



浙商院文库

贾继用 著

元明之际 江南诗人研究

- 至正、洪武之际,江南诗人的出处和遭际必然带有乱世的时代特征。
- 或隐居,或出仕,或死于战乱,或下落不明,他们的处境和抉择直接影响了江南诗坛的面貌。

齊魯書社



浙商院文库

贾继用 著

元明之际 江南诗人研究

- 至正、洪武之际,江南诗人的出处和遭际必然带有乱世的时代特征。
- 或隐居,或出仕,或死于战乱,或下落不明,他们的处境和抉择直接影响了江南诗坛的面貌。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研究 / 贾继用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333 - 3018 - 7

I. ①元… II. ①贾… III. ①诗人—人物研究—
中国—元代~明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9472 号



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研究

贾继用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莱芜厂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18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3018 - 7

定 价 68.0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术专著出版资金资助

序

王朝史与诗歌史的起止兴衰有时并不一致。元明易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更迭的历史时期,也是元诗终结和明诗开始的历史时期。这一过渡时期,具有诗歌史的一贯性,不能遽然以朝代的更迭分出彼此。然而,改朝换代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对诗人及其创作造成极大的影响。在此过程中,诗人的出处、遭际及创作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征。

贾继用《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研究》就是对这一时期诗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

本书所谓的“江南”,主要是指元朝江浙行省北部,即除去福建省之外的江浙行省。这一地域之内,自然文化环境基本一致,诗人交往密切,共属于同一个地域文化圈。而在元末明初的特殊历史和文化环境中,在一定意义上,江南诗人的出处、遭际和创作可以反映全国诗坛的面貌。因为,这不仅是江南诗人占据了当时诗人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而且,元后期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曾寓居江南,并参与江南诗人的活动。所以,以江南诗人作为切入点具有其科学性。

本书旨在考察至正、洪武之际(1341~1398)江南诗人的遭际、出处情况,理清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面貌,为元末明初诗歌史的研究做了坚实的基础工作。此前,研究者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相对比较零散,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作家作品,就是在元明文学研究的总论中简要提及,尚未见同类整体考察和研究的著作,因此,本书研究范围和角度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对于元明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本书第一次从诗人的角度细致考察了元明诗歌过渡时期的江南文学生态。

元代末年,诗人众多,诗社林立,诗坛鼎盛。而经过明朝建立之后短短三十年的时间,诗人零落,诗社瓦解,诗坛沉寂。那么,为什么在异族统治时期文学如此兴盛而在作为汉族政权的明王朝建立之后反而趋于消沉?这其实是把握元明

之际江南诗坛的一个关键问题。本书通过对元末战乱中江南诗人的出处与遭际的考察,一方面还原了元末诗坛面貌,即元朝最后近三十年间(1341~1368)是元代诗歌的全盛时期;另一方面,揭示多数元末诗人以元朝为正统的心态。

这种心态其实是他们入明之后很难与新朝合作或融入新朝的内在原因,从而促使明初君臣上下睽离的危险状态,最终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朱元璋的“士不为君用”之法和杀戮政治的出现。明初诗人的命运与此不无关系。

换言之,在元末,政坛之外允许一个诗坛中心的存在。在明初,政坛之外绝不允许诗坛中心的存在。这是元明易代之际反映在文坛的最明显的事实和时代特征。

本书就是把握了上述具有时代性的关键点,勾画出元明诗坛在江南过渡的文学生态,廓清了元明诗歌在江南的过渡和转折,即元诗在江南的终结及明诗在江南开始的历史契机,不仅修正了以往“元诗衰落”的似是而非的结论,而且对于学术界重新审视元代文学的格局,以及对明代文学的定位均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这种探索无疑是有益并富有启发性的。

其次,本书文献考证严谨,部分考证结果弥补或纠正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与谬误,结论令人信服,显示了作者的扎实的文献功底和考辨功力。

以大量的文献为基础是本书的显著特点,也是文献学研究的基本途径。作者对至正、洪武之际江南诗人做了细致的搜集和考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对高启之死的探讨,作者根据明初文献,提出多条反证,有力地反驳了历来的推测之论,细密而严实,具有说服力。再如,关于徐贲的生平履历的考证,孟昉生卒年的考证,纠正了史传的错误和前人研究的不足,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基本功和较高的学术素养。

当然,本书在宏观把握和研究深度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空间,如对江南诗人的作品及其心态的研究尚嫌不足。

这部著作是其博士论文修改补充而成,在即将出版之际,请我为之作序,作为他的导师,我欣然应允,一为鼓励,一为期望。

是为序。

杨 镰

2013年8月15日

目 录

序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至正后期江南诗人的出处 011

第一节 群雄割据与江南诗人群落 011

第二节 乱世中江南诗人的出处 023

第三节 乱世中死难的诗人 040

第二章 洪武初年江南诗人的动向 051

第一节 诸儒进京和入仕新朝的诗人 051

第二节 新朝下的隐逸诗人 077

第三节 新朝下的遗民和死节诗人 090

第三章 由元入明江南诗人的命运和遭际 115

第一节 朱元璋的待士和洪武年间的文人政策 115

第二节 洪武年间贬谪流放的诗人 129

第三节 明初死难的诗人 151

第四节 朱元璋对诗人的折辱:廷杖、输作及其他 168

第四章 元明之际失踪诗人考 173

第一节 从张羽《怀友诗》说起 173

第二节 元明之际失踪的诗人——以吴中诗人为例 186

结 语 199

目 录

附 录

一 洪武年间被贬谪流放的诗人简表 205

二 洪武年间死难的诗人简表 210

三 至正、洪武之际江南诗人表 214

四 《〈明史·徐贲传〉纠谬》补正 293

五 再论高启之死 301

六 元西域作家孟昉生卒年与创作考 310

参考文献 319

后 记 327

绪 论

一

元末明初是指元顺帝至正年间和明太祖洪武年间,即从1341年到1398年将近六十年的历史时期。与以往的改朝换代相比,元明鼎革对江南诗人的心态和出处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诗人的遭际和命运除了带有乱世的特征外,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也尤为明显。

江南是一个历史概念,时代不同,所包括的地理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因而今人使用这一概念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到了隋代,江南其实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南的含义。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也是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而最狭义的江南地区,是指苏、松、常、嘉、湖五郡。^①

由于“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则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在各个研究者的论著中,‘江南地区’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李伯重因此提出划分“江南地区”的两条标准:

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

^①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147页。

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

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①

据此认定,苏、松、太、常、杭、嘉、湖、宁、镇为明清时的江南地区。“然而就在这八府一州的范围内,无论是地形地貌、抑或是经济水平都存在明显的东西部差异,仅仅依据水系河流与经济联系来界定江南这一历史形成的概念尚嫌不足。”^②

本书认为,江南诗坛的“江南”,不惟必须具有地理的范畴,同时还要有文化的含义:^③

第一,必须在传统的江南的概念范围之内。

第二,同在一个或相似的文化圈。以元明之际诗坛的生态而论,这一区域的诗人交往密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元明之际诗坛考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大部 and 浙江全省在传统广义的江南范围之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元末诗人唱和和雅集可以看出,这一地域之内诗人交往尤其密切,起码可以这样认为,就当时诗人而言,他们是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圈。这也是本书所使用的“江南”的范围及其原因。

概言之,本书所使用的“江南”概念大致是元代江浙行省北部,即除了福建省之外的江浙行省的地域范围。

由此带来的是江南诗人的界定,本书论述江南诗人就是元灭亡之前滞留在上述地区的诗人。具体如下:

①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页。

③ 这点周振鹤先生业已提及,但没有展开论述。

第一,籍贯在上述江南的范围之内,生于斯,长于斯,一生或大部分时间未曾离开江南。

第二,籍贯在江南,因仕宦而流寓他处。

第三,籍贯不在江南,却长期流寓和出仕于江南。

第四,占籍江南和长期任职江南的蒙古色目诗人。

第五,还包括相当一部分与江南诗人交往密切,长时间滞留江南并参与江南诗人诗歌创作活动的过境诗人。

二

元明易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蒙古政权退出中原,汉人重主中原,所谓“用夏变夷”,这是非同一般意义上的政权之间的更迭。至正、洪武之际,江南诗人的出处和遭际必然带有乱世的时代特征。

江南是元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元末的江南诗坛也最为繁荣。顾嗣立曰:“迨至正之末,而奇才益出焉。”^①此时江南诗人之多,创作之富,诗人活动之频繁,盖历朝皆无。玉山草堂、北郭诗社,文采风流,倾动当世。元后期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曾流寓江南,元末诗坛的鼎盛是从江南开始的。

至正十一年,红巾军起事,从此天下大乱,江南遂成为群雄割据的局面。诗人的出处和遭际,在乱世的背景之下,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或隐居,或出仕,或死于战乱,或下落不明,他们的处境和抉择直接影响了江南诗坛的面貌。经过二十年的战乱,朱元璋剪除群雄,建立朱明政权。朱元璋的重典治国和洪武年间的文人政策,使刚刚从硝烟、死亡、恐怖、颠沛流离中走出来的诗人又重新陷入彷徨无归、进退失据之中。元明易代并没有为诗人提供他们所期望的生存环境,洪武年间的诗人无可奈何地坠入了整体沦落的尴尬困境。

元明诗歌的过渡是在江南开始,江南诗人的活动、境遇和出处则是这个过

^① [清]顾嗣立:《元诗选·凡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页。

程的重要环节和内容。缺失这个环节和内容,元明之际诗坛的面貌就不够完整,易代之际诗歌的过渡和衔接就变得模糊不清。而当前学界对于易代之际诗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或元末江南士人心态和风尚的研究,对于至正、洪武之际诗人的遭际和出处以及由此带来的江南诗坛的变化缺乏必要的整体性考察。

杨镰先生指出:“文学在元明之际的过渡与文学家在这一时期的处境,对于元代文学归纳出特点,为明代文学作定位研究,都有特殊意义。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一直是相对薄弱的领域。”^①

所以,考察至正、洪武年间诗人的出处与抉择及其在鼎革之际诗人的遭际与命运,对于廓清元明易代之际江南诗坛乃至元明诗歌的过渡和转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当前元明之际江南文坛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而江南诗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著名诗人或诗人群体的个案研究,至今还未见以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的出处和遭际及其对诗坛格局影响作整体研究和考察的专著。

在涉及江南诗坛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著作之中,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部研究西域人汉化的开山之作,其中涉及许多占籍江南并在江南诗坛有广泛影响的西域诗人,如贯云石、迺贤、泰不华、丁鹤年、余阙、伯颜子中、鲁至道、孟昉等,这为研究元末蒙古色目诗人在江南的活动及他们在易代之际的文化背景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萧启庆先生是专门从事元代历史研究的专家,其一系列的著作之中,如《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②、《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③、《元

① 见贾继用《张羽“怀友诗”考论》篇后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6期。

② 萧启庆:《元朝史新探》,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

③ 萧启庆:《元朝史新论》,允辰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①、《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皆关乎元末江南诗人在乱世中处境和抉择。

此外,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②、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罗仲辉《论明初议礼》^③、《明初史馆和〈元史〉的修纂》(《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罗炳绵《明太祖的文字统治术》^④、邓嗣禹《明大诰与明初之政治社会》^⑤、杨炳功《明代的廷杖及其实质》(《南都学刊》1987年第4期)、曹国庆《明代的廷杖》(《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都对元末明初的政治社会环境作了探讨,为研究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的出处和遭际提供了历史的依据。

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⑥、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徐子方《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则从思想史和心态史角度涉及元明之际文人的矛盾心理。这为考察元明鼎革之际诗人的出处和抉择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在涉及元明江南诗人和诗坛的研究论著中,杨镰先生《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第一部以西域诗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开创性的专著,对于占籍江南的蒙古色目诗人的创作、交游和心态作了细致地考索,尤其是勾沉出许多在文学史上不为人留意甚至失踪的江南蒙古色目诗人,为恢复元末诗坛的真实面貌和易代之际江南诗坛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是杨镰先生的另一部力作,也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元代诗歌发展历史的专著。书中第四卷《南方诗人》共十一章,从不同侧面对元代南方诗坛作了探讨。其中第八章《南方诗人在元明之间》,把元末南方诗人分为“赴难诗人”、“避难诗人”、“述难诗人”,具有典型性地考察了战乱

① 萧启庆:《元朝史新论》,允辰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② 郑克晟:《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罗仲辉:《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 吴智和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大立出版社1985年版。

⑤ 《明朝开国文献》第一册卷首,学生书局1966年版。

⑥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

中的江南诗人的出处行藏和遭际。第九章《江南地方诗坛》更对元末江西、福建、鄱阳、睦州、天台、宣城等地诗坛作了专题研究。《元诗史》对于元代及易代之际诗歌和诗坛的研究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本书的写作思路即来自《元诗史》。

《元代文学编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以编年体例考察元代文学和文学家及其活动,虽曰元代,实际上也包括明初的文坛概貌。此书对元明之际的诗人及其活动有细致的考证,可以作为《元诗史》之补充,对于元代文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元代诗歌研究中,杨镰先生是第一个全面研究元代和元明易代诗歌发展历程和诗坛走向的卓有成就的学者,除上述专著外,先生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皆是具有开创性的开山之作。《元代文坛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文学遗产》2004 年第 6 期)、《答禄与权事迹勾沉》(《新疆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顾瑛与玉山雅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9 期)、《元诗文献新证》(《山西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民族文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元佚诗研究》(《文学遗产》1997 年第 3 期)、《元僧诗和僧诗文献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等作品对元代尤其是元明易代之际的诗歌和诗坛的盛衰消长及诗人的生存状态和走向都作了较为集中的考证,对于元代诗文乃至元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奠基和启发意义。

王忠阁的《元末吴中诗派论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一书论述了元末吴中诗派的形成、活动及诗歌精神,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借鉴。

史洪权的博士论文《高启生平考论》(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以元明之际吴中诗人高启为研究对象,对其生平中若干重要问题,如对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高启辞官的心态、高启与吴中四杰以及高启与北郭诗社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附有《高启年谱》,考证严谨,时有创获,可资参考。

董刚的博士论文《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对元末明初这一剧烈变动时期的浙东士大夫群体进行了整体考察,展示了其内部生存状态、相互关系、时代作用和社会影响,并借此考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济世思想、仕隐选择、道义气节等诸方面的内容。文章对浙东士大夫在元末的出

处和明初的遭际多有涉及,然其范围主要在浙东,研究对象是士人整体,着眼点是浙东士大夫在元明之际的兴衰历程。

彭茵的博士论文《元末江南文人风尚与文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认为元末江南文人们的崇尚,不仅影响了元末文人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多样的文学风貌——深受传统伦理道德影响而选择忠于元廷的文人,其文艺创作往往严正端方;企图以不同方式忘怀世事的文人,为了调和人格与世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只能通过文艺创作来舒缓动荡时局对其内心的挤压,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对自由生命的渴求,也因此往往超越常态;秉持用世之心的文人,其作品自然会对时事投以更热切的关注;而士商亲融以及多族文人往来频繁的元末新风尚,同样也使得文人们的创作出现了迥异于前的新气象。文人风尚的多样性构建了相对活跃的文化氛围,元末文学的繁荣,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这对元代隐逸之风的形成和影响,江南文人的价值抉择的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玉山雅集是元末东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诗人群体活动。谷春霞的博士论文《玉山雅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对于元末活跃于吴中的这一诗人群体的兴衰历程作了全面的考察。文章指出,“战乱中雅集文人的心态从不以为然到忧心忡忡、惊慌失措,其作品内容和情感也随着形势的走向不断变化,忧时伤乱和压抑苦闷是战乱波及昆山后的主基调”,这其实是元末江南诗人的心态的变化过程,也是战乱对于诗人的影响。文章又附有《玉山雅集活动年表》,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本书研究相关的重要论文还有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李修生《14世纪的中国文学》(《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左东岭《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陈建华《明初政治与吴中诗歌的感伤情调》(《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筱南《简论元末明初士风转变对诗文创作的影响》(《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王恩俊《明初隐士群体的政治取向与道德实践》(《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汪红亮《试论明初入仕为官的境遇与心态》(《江西师范大学

学报》2005年第3期)、张玉华《玉山草堂与元明之际东南的文士雅集》(《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杨杭军《朱元璋与明初江南士人》(《河南师范大学》1992年第1期)、黄仁生《铁雅诗派成员考》(《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林红《元遗民诗人文化特征论》(《长春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王德金《论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宋强刚《朱元璋的养士、用士与明代之士风》(《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3期),等等,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对元末明初诗人和诗坛及其背景作了卓有见地的探讨。

以上仅仅是与本书研究相关且较为重要的单篇论文或论著,至于其他著述或研究,间或偶有涉及,非专门探讨者,不一一罗列,而对江南诗人的文学性研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未列入,限于条件,恐或有些研究成果笔者未曾寓目。

四

毫无疑问,元明鼎革之际的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其中大多是个案研究,相对比较零散,而对于至正、洪武之际江南诗人群体的出处、遭际和倾向作专门整体性研究的论著还未曾见到。鉴于此,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这方面的探讨。

(一)至正后期江南诗人的出处和遭际

至正二十八年之间(1341~1368),其中有二十年的时间,江南一直处在战乱之中。群雄割据,直接促使江南诗坛形成几个大的诗人群落。金陵、吴中、浙东是当时江南最大的三个诗人集中的地方,而尤以吴中为盛。此期的二十年间虽然战乱频仍,却是元朝诗歌鼎盛的时期。江南诗人的出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然而以元朝为正统的观念深入士人心中,“君臣之义”超乎“夷夏之辨”,在一定意义上,无疑影响了他们仕隐的抉择。元末江南死难的诗人之中,忠元型诗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为元朝死节,就是这种心态和立场的最壮烈的体现。

对于元末江南诗坛现状和诗人出处与遭际的分析,起码可以得出两条结论:

第一,“国家不幸诗家幸”,江南战乱频仍,诗坛鼎盛。

第二,多数诗人以元朝为正统,忠于元朝,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死和出处。

其中第二点是明初遗民诗人产生的根本内在原因,这也是后面论述的一个依据。

(二)洪武初年江南诗人的动向

明朝建国伊始,为了巩固政权基础,朱元璋大规模征召儒士进京。一时,无论是元朝故官,还是山林隐逸之士,群集京师,其中相当一部分诗人出仕新朝。金陵诗坛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在明太祖的征召之下,仍有相当一部分诗人热衷于归隐,放浪形迹于江湖草泽之间,而更有一部分诗人以元朝遗民自居,拒不入仕,甚至在入明十年以后,仍为元朝死节。明初江南诗人的动向和他们在明初之中的出处抉择,反映了洪武年间江南士人和朱元璋及其朱明政权的疏隔,明初诗人的命运和遭际与此不无关系。

(三)由元入明的江南诗人命运和遭际

明朝建国之后,随着朱元璋待士态度发生变化和明初文人政策的形成,诗人的处境也急剧恶化。朱元璋对士人的折辱和明初屠戮政治的震慑,使他们几乎还没有从元末战乱的痛苦记忆中走出来,便无可奈何地坠入彷徨无归的忧惧之中。相当多的诗人被贬谪流放,被诛身灭族。明初江南诗人的遭际和命运陷入了历史的最低点,诗坛在短暂的繁荣之后也坠入了低谷,在一定意义上,明初诗人悲惨的命运潜藏着诗风转变的契机。

(四)元明之际的失踪诗人

在充满战火、杀戮、动荡和颠沛流离的二十年的元末战乱之中,江南诗人或殁于战乱,或终老山林,而更多的人则湮没无闻,下落不明,不知所终,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诗人,其中不乏曾在当时诗坛有着广泛影响之人。进入新朝,更有许